

# 1931年前后蒋介石、顾维钧关系述论

张祖堯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顾维钧在外交政策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并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尽管两人因思想体系和政治目标截然不同,难免出现诸多分歧,但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不仅体现了蒋、顾之间互相包容的微妙关系,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的特殊形势。

**关键词:**1931年;蒋介石;顾维钧;中国外交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5-0117-06

近年来,抗战前后的中国外交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外交就是“互动”,就是国与国之间,外交人物之间为达到一定的外交目的而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全方位的、立体的“互动”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关注单个外交人物,如宋子文、顾维钧等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纵向关系,而很少注意和研究相关人物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外交人物之间、外交人物与本国元首之间的关系。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并始终与英美等国交往甚密。他曾先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蒋介石的麾下,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身为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的蒋介石“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1](363页),在外交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蒋对专制统治颇感兴趣,而顾则向往自由主义。尽管蒋顾二人地位不同,但在外交事务方面却常常意见相左,时有摩擦发生。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 一 蒋、顾关系的渊源

1928年以前,顾维钧与蒋介石从无任何直接接触。据担任过顾维钧幕僚的杨玉清回忆:“顾维钧曾亲口对杨说,他与蒋介石本不认识,原无交谊,只是1928年顾氏遭国民党通缉时,蒋介石曾使张群、方本仁等向顾表示说,这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他在南京,必不至此。从此以后,他才与蒋有联系。”[2](197页)

20世纪20年代末,顾维钧已经经历了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以及以后的军阀混战。留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身的顾氏,对旧式中国军阀闭塞、狭隘的派系斗争完全失望,对时局极不满意。他无意涉足任何国内争端,而且认为自己的力量“就在于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倾轧,超脱于各派斗争之上”[3](315页)。顾氏信仰的西方自由主义和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军阀派系都无法吻合。因此,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从事外交事业一个最直接、单纯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3](297页)。但是,顾氏的政治敏感告诉他,与旧式军阀不同的国民党在此时显示出勃勃生机,“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3](297页)。

收稿日期:2003-01-02

作者简介:张祖堯(1980—),女,四川省西昌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指导教师田利军副教授。

1926年,顾维钧出任财政总长,顾与蒋的历史渊源由此开始。其时,身为财政总长的顾氏与金融界接触频繁。“银行领导人的政策和使用的腕对国民党是有利的,银行的利益和政界的利益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3](297页)。基于这样的认识,顾氏开始从接触的大批银行家那里间接了解蒋介石。他认为,“如果没有财政上的支持,一个政界领袖是不可能拥有远大前程或取得重大成就”[3](315页)。显然,顾氏投向蒋介石的目光是赞许的。蒋和督军们不同,“他从没有想到需要个人发财致富”,“完全了解财政问题的重要性”[3](315—316页)。非但如此,顾维钧甚至觉得蒋氏“不仅懂得指挥军事战役的艺术,而且也懂得不战而收买军事将领的艺术”。从那时起,此种对蒋的好感就已经为两人今后的共事埋下了伏笔。

1926年10月5日—1927年6月17日,顾维钧经历了短暂的总理时期。由于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分歧过大,他曾先后婉拒了张学良、汪精卫的聘任。顾氏的外交生涯此时发生了惊人的转折,即由一个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北洋政府要人变成了南京政府的重要一员。

随后几年,国民党完全沉醉于内战与争权之中,久已觊觎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为此,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备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处理日本侵略问题时咨询[3](416页)。顾维钧被任命为该会的成员。由于工作需要,顾先后与蒋有过几次接触。根据顾的回忆,与蒋的进一步接触正是在特别委员会休会、顾返回北京之时,顾接到蒋特别指示,并附有一张作旅费的300元支票。但顾退回支票,附函感谢蒋的盛情[3](418页)。

此时,蒋介石担负着结束军阀混战的重要使命,其发展正值高峰期。1931年11月,宋子文代表蒋赴京请顾担任外交部长,遭顾拒绝。宋表示“是委员长特意要他代表来劝驾的”。事实并非如此,任命顾氏为外交部长是“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蒋只是执行这一决定。顾非常清楚,“无论是政府或指导政府政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决意起用我参加政府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严重局势”[3](419页)。当然,南京此举还在于顾氏身份特殊。就顾氏而言,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官,被认为是“独立的、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参与旨在统治国

家的军事斗争”[3](297页),自然受到欢迎。他虽然任职于多个不同的政治派系所组成的政府,但顾氏并不代表任何一派的政治利益,其单纯的国内政治背景对蒋介石及其党派不会带来威胁。所以,顾维钧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战线上的一员理所当然。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奔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蒋、顾第一次“合作”,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日本军队向中国的继续推进,促使国民党内部摩擦愈演愈烈,几乎所有派系都要求蒋下台,国内形势极为混乱。从职业外交的角度及趋利避害的要求,顾主张与日本谈判,以“减少最小程度的伤害,保护最大程度的利益”。这种观点显然不为公众接受,随着蒋的第二次下野,顾氏辞去了外长职务。

事后,顾氏分析了对日谈判不可能实现的原因,认为:“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对于蒋介石,顾氏认为在与日本谈判上,他与蒋达成了共识,“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但顾又认为任命自己为外长有“挡箭牌”之嫌,“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指蒋介石)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选择他,无非因为他“不是国民党人而是无党派人士,又闻名于外交界”[3](425页)。此后,顾氏作为中国代表进入李顿调查团,与蒋的共事暂告一段落。

## 二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顾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共识与分歧

“九一八”事变后,顾氏先后经张学良、宋子文等人举荐,受蒋介石之邀,进入由国民党执政的南京政府。显然事变使顾氏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转折,尽管他的外交立场并无任何质变。

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使得蒋、顾不得不正视中日问题。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从政治形势、军事实力还是从经济环境分析,此时的中国与日本都无法同日而语。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顾氏和对外交抱有极大热情的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弱国外交得体,足以转换局势。最适当的外交方式就是选择与当事国日本谈判,最小程度地减少损失。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蒋、顾均肯定同日本谈判的必要性,因此,民众普遍认为此举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自然顾氏也成了“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3](424页)。应当看到的是,作为职业外

交家的顾氏一直把“谈判”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他始终强调拒绝谈判“只会落入日本少壮派军人设置的圈套,为日本提供扩大武装入侵的借口”[5](145页)。这不无道理。立足政坛多年的蒋似乎不愿轻易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最终结果是谈判在民众的反对呼声中破产。

虽然蒋、顾对国际国内环境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但同样与英、美等世界大国关系密切的他们此时都把“求助国联”看成是除了直接与日谈判以外的另一个解决途径。1931年9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时,蒋发表讲话:“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在出席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时蒋再次提出“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的方针[6](199页)。顾建议蒋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请,以引起世界公众的关注。

蒋、顾主张采取对日谈判,求助国联,并不代表两者认同日本侵华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蒋抗日的态度与行动仍是积极的。顾也十分赞成这种举动。抗日使得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目标的蒋、顾走到了一起。蒋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几次提到“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更在同年11月宣布“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6](195—199页)。长期以来,顾氏一直是国内力主团结抗日的重要力量,他认为求助国联的另一个目的是争取时间准备武装抵抗。

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顾保持外交方向一致,但是他们在不少具体事务上仍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两人对“求助国联”含义的不同理解上。顾氏认为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外交手段,中国与日本当局的接触才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3](414页)。在“求助国联”和“同日本谈判”两种方案上,蒋却更侧重于前者。其实,早在10月底国联代表拉西曼出席南京政府要员会议时,就提出了“中国应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3](418页),这完全与包括顾氏在内的“特别外交委员会”提出的“赞成谈判”的观点恰恰相反。但蒋似乎同意前者的建议。在11月接见各地学生请愿团时,他提出“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的主张,这充分说明在这点上蒋、顾存在分歧。

另外,面对混乱的国内国际形势,究竟“攘外”还是“安内”,他们显然存有不同看法。1931年11月30日,蒋在主持顾氏就职典礼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6](195页)“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蒋的战略重心完全放在“剿共”问题上,甚至事变当日,蒋还偕同周佛海等人赴江西“督剿”红军。对于蒋而言,共产党是他最大的敌人,惟有“剿共”彻底,方能“统一”而“取胜于外”;而又只有完全依赖国联,才能使他更坚定“安内先于攘外”的决心,即前者成为后者的先决条件。顾氏对此并不赞成,认为这是“国民党早期的典型思想”,与若干中国历史近况有关。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另一层面含义,是南京政府官员害怕在应付共产党威胁的同时又抗击日本侵略,会处于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而且顾氏认为所谓的“统一”,远非“仅仅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所谓无法积极抗日,不过是“因为这样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失去自己优越地位,而助长地方势力出头露面”[4](201页)。对蒋反复强调的“依靠国联”,顾氏认为,其原因是以蒋为首的某些政府要员需要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保证,否则不敢轻易承诺,冒险抗日。显然,顾氏点破了蒋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顾是以抗日为重的。

### 三 蒋、顾关系的成因

蒋、顾关系绝非表面看来那种普通的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对此上文已有较充分的说明。那么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国际环境、个人原因等方面来分析。

#### 1. 美国影响

自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发展趋势逐步延伸到20世纪初,不同的是对中国有最大影响的西方强国已由英国变成了美国。美国以经济、军事等手段不断向中国大陆渗透,并且持续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和支配。美国的东亚战略,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政治统治体系显然是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凭着宋氏家族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蒋介石曾一度被视为美国所认可的“中国领导人”。顾维钧自1904年留学美国,深受美国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三四十年代顾与胡适在外交界的崛起代表了美国文化向中国的渗透。顾与胡

都深知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蒋把对美外交摆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与国内反蒋各派,特别是与日生死存亡的较量中,他急需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为这一点,蒋容忍了美国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影响。正是这样的“幕后”因素,允许蒋、顾并存于同一政府下并在若干重大外交活动中共同行动。

## 2. 日本因素

如果说美国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影响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那么日本强势侵入中国却不自觉地将中国各种势力推到了“民族救亡”的大旗之下。

北洋政府以后的顾氏,原本“打算离开政界,完全放弃外交和政治生涯”,但在1931年夏他开始为“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甚至预感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局势,他说“如果日本这次采取行动,可能要成为严重事件”[3](412页)。在这一时期,顾维钧十分关心日本问题,并积极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这无疑加强了他与国民政府的联系。虽然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寄希望于国联,但顾氏认为,“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支持,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事实上“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顾氏的观点使蒋不安[3](414页)。但是,毕竟在求助国联这一点上的共识拉近了蒋、顾双方的距离,这才有任命顾氏为外交部长以处理对日问题的举措。应该说,由中日民族矛盾引发的深刻的民族危机把中国各个派系、各种力量推到了一起。

## 3. 蒋顾的个人原因

### (1) 顾维钧

一直以来,顾氏处于一种“矛盾”的“社会形态”中,他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于一身;另一方面,他也是少数担任政府公职却与政府的政治目标难以吻合的知识分子之一。诚如其所言,“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3](297页)。他之所以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他工作的宗旨则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7](27页)。显然,顾氏长达8年的留美经历“奠定了他在政治与外交生涯中青云直上的基础”[8](88—93页)。

顾氏本人十分向往民主政治,但是历经宦海沉浮,他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相当了解,并曾就1912—1928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失败提出了一些看法。

在他的眼中,民主政治在美国“确实是深深扎了根的”,中国却往往缺乏这种“美国式民主的基础”[3](366页)。尽管顾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从来未能理解民主为何物”,“缺乏互谅的精神和不能正确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缺乏对法治的重要性的认识”,但顾氏仍然对民主政治满怀信心,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只不过是时间和训练问题”[3](370—373页)。

尽管蒋介石所奉行的专权、独裁的一元路线和顾氏“美式民主”的多元化路线背道而驰,但是,面对复杂的中国社会环境,作为现实主义外交家的顾氏又认为,“在中国威望很重要,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享有像蒋介石那样威望的其他领袖人物”[9](5页)。这种见解或者源于顾氏对蒋氏及其国民党能够适应思想混乱时局的一种诠释;或者源于顾氏自由主义思想对各种势力的包容,结果顾氏将蒋、顾之间始终存在的分歧长期埋藏于蒋、顾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之中,这虽然稳固了蒋、顾的关系,但却使顾氏的外交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 (2) 蒋介石

蒋氏与近代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不同,他更大程度地参与外交事务,并集行政、外交权利于一身。蒋氏在1931年12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又再度出任主席,由此改变了林森任主席近13年间的虚位元首制。此时的蒋氏,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对外不仅可以代表中华民国,还可以直接“与外国政府进行谈判,出席国际会议,签订条约”[1](363页)。蒋本人对外交持有极大热情,对外交事务十分熟稔。蒋氏身兼各种要职,又频繁涉足外交领域,不能不对顾氏这类单纯意义上的外交官产生冲击。曾在多个政府任职的顾维钧显然对此自有一番感悟。蒋之前的“统治者”对外交关系所表示的关心程度不同,对中国驻外使节的观点所给予的重视程度自然不同。顾认为袁世凯很重视外交,但“袁世凯总统的继任者们不大参与外交事务,黎元洪总统和冯国璋总统均是如此。徐世昌是个学者,受过极好的教育,由于长期与袁世凯合作,他完全理解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但他虽关注此事,却缺乏自信,感到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因此将对外事务一任外交部去办”。他们给了诸如顾氏这样的外交官很大的自由度。在顾氏眼中,袁世凯和蒋介石有着相似之处,袁“对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

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但他们又存在很大区别,袁重视外交部,并与他们关系密切。蒋则截然不同,外交上专制、独裁,对此顾氏颇有微词。他说,“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非但不屑于征求中国外交代表的意见,而且常常在作出决定时除通知那些驻在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外,对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甚至连通知都不给”,“显然国民党的领导者们自己懂外交,他们熟悉情况”[3](390—393页)。蒋对此也自有解释,“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10](86—96页)。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公使降为外交部长的代理人”,再也没有人向顾氏征求意见[3](393页)。顾氏这里所提到的“外交部长”已经不再是他自己或其他的外交官,而是和蒋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人物”,甚至蒋自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宋氏家族以及与蒋有姻亲关系的孔氏家族在外交界的显赫地位,孔、宋两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及能量,比如宋美龄、宋子文等都先后代表蒋介石赴美。对此,顾氏也曾提到“蒋委员长又和宋博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外交方面几乎让他放手行动”[3](418页)。除了运用“亲属外交”,蒋的外交还有另外一面,即“特使外交”。特使们不同于职业外交人员,他们多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头衔出使各国,较著名的有孙科、杨杰、贺耀组、李石曾、蒋百里和颜惠庆等。“由于国民政府的外交制度对‘特使’和‘常使’的职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外交权又高度集中于蒋介石手中,使得特使们往往‘有恃无恐’”[11](93页)。蒋对于这种“多管齐下”的外交方式颇感陶醉,顾氏对

此持保留意见。他说,“虽然在外交队伍里也有几位很能干的高级军官,但是你根本无法断定在关键时刻他会说出什么或作出什么”[12](125—126页)。

不难看出,蒋、顾的合作与分歧实际上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合作”决非偶然。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中国外交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外交得失,是与蒋、顾以及同蒋存在亲密关系的各类型人物的外交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1931年前后的蒋、顾关系,是在分歧与共识的交错中演绎的。这种极为特殊的关系格局是当时的外交环境所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外交的走向。

蒋氏以国家元首身份直接涉足外交,并由此衍生“家族外交”、“特使外交”,再加上大批以顾氏为代表的职业外交人员,这就构建出当时中国外交人才及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蒋的直接干预和不规范外交活动造成了外交职能的混乱,使外交程序冗长、繁琐,使职业外交人员的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但外交人员的多元化,带来了信息途径的多元化;外交思想的多元化,显示了外交政策的灵活性。蒋以常使、特使为形式,以顾维钧为典型的外交推动了中国外交思想的交融,也保持了中国外交史上难得一见的“平衡”。

应该说,蒋、顾关系伴随着当时中国外交的多元化格局而发展,蒋氏用外交的多元化“认同”顾氏的存在;顾氏以思想的多元化“包容”蒋氏的策略,这也是二者有可能“合作、共事”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 [2]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A].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肖岗.顾维钧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 [6]李勇,张仲田,等.蒋介石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7]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傅德华,傅骏.顾维钧研究概述[J].学术月刊,2001,(6).
- [9]顾维钧回忆录:第七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蒋介石事略(台北)[M].91页.转引自: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J].民国档案,2002,(1).
- [11]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J].民国档案,2002,(1).
- [12]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About Relation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Gu Weijun Around 1931

ZHANG Zu-yan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of 1931, Jiang Jieshi and Gu Weijun are uncertain agreement on diplomatic policy and start their first "cooperation". Although there exist enti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ideologic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aims, which inevitably resulting in divergences,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finally brings them together,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their subtle relation but also shows the special form of China's diplomacy of Jiang's 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s multi-factor diplomatic policy.

**Key words:** 1931; Jiang Jieshi; Gu Weijun; China's diplomacy

[责任编辑:凌兴珍]

### 书讯

## 王启涛教授《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启涛所著《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一书,已于2003年4月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全书共计33万字,分为八章,书前有董志翘教授所作序。在该书的第一章至第三章里,作者论证:中国法制文献由于具有“平民大众化、方便简易性、忠实程度高、同时资料多”四个特征而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口语及方俗语,有其无以替代的语料价值;接着,作者对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文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和评述,然后对中国法制文献进行了重新分类。在第四章至第八章,作者以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特别是敦煌文书为重心,同时广泛利用当时的汉译佛典、敦煌变文、诗歌、散文、小说、史书、子书、类书等其他语料作为旁证,并把语言研究置于当时广阔的人文、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背景之中,从微观到宏观,从共时到历时的不同角度,对传世及出土的法制文书中的新词、新义、常用词演变、构词法等作深入的探讨,并对这些语料中的语法、语音现象进行了认真梳理,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对法制文书里的一些语言借用与融合现象做了新的思考,认为在重视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影响的同时,还应重视汉语对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同时,该书对法制文书里大量的语音通用与简化现象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不应简单地把唐五代西北方音与《切韵》音系看成继承关系。书中还对一些法制术语如“赔”、“吃”(表示被动)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实而新颖的考证,并纠正了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与大型语文性辞书及法制史研究文献里许多词语的误读、误训和误校。该书还认为,当前的汉语史研究,应该在专书研究与断代研究的同时,加强体裁语言的研究。该书倡导语言学家与法学家携手合作,为建立科学的法律语言学与法制史学而共同努力。

董志翘教授在序中指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语言学功底,还能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如词汇扩散、词语扩散、词义感染、词汇兴替与结构变化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里的诸多语言现象,且言之成理,体现出很强的理论语言学素养。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周密比较考证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古、近代法制文书的语言做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填补了汉语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缺,具有开创意义。”(二晋)